

編者按

今年是胡適先生百年誕辰。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研討會上，學者們對蓋棺近30年的胡適，顯然還無法定論。本期「百年中國」摘編的八篇論文，都涉及到與胡適密切相關的幾次重要文化論戰和批判。從1919年胡適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的爭論，到50年代與台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殷海光的歧見，數十年間，儘管胡適的爭論對手完全不同，但他始終堅持「點滴改良主義」和「溫和反對派」的自由主義立場。

直到今天，這些論戰話題依然有意義。發生在1920年前後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和「科玄論戰」，涉及到在全面社會危機形勢下對改良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歷史性選擇，以及對有巨大社會動員能力的意識形態之追求；30年代文化論戰則是處於日本入侵的民族存亡年代對傳統與西化的反思（「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對國民黨踐踏人權的抗議與妥協（「人權論戰」），以及對中國應該實行獨裁專制抑或是民主憲政的爭論（「民主與獨裁」論戰）。到50年代初胡適在大陸被定為「美帝國主義反動買辦文人」，被「批倒批臭」。從胡適的經歷和思想，我們可以看到自由主義在中國由世紀初新興，到逐漸式微，直至被視為「危險的反動思想」的歷史命運。

這一歷程向我們提出兩個不可迴避的問題：第一，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否從一開始就「包含了不少無法解決的自我矛盾」（林毓生語）？第二，近代以來一直處於劇烈變動的中國社會，是否可能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生存發展提供必要的公共空間？